

移民与民俗散论

——以明清以来土默特地区为例

张文生

(内蒙古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2)

[摘要] 明清以来,大量的农业移民在短时间内大量迁徙至土默特地区,使该地区生产方式、民族结构和文化观念逐渐发生改变。农业经济方式的开始与扩大,使原有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物质民俗发生改变;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人口的大量移入,使该地区民族结构以及以血缘为纽带人身隶属为主要关系的部族社会民俗发生变化,移民文化观念的植入(前期主要是汉族,后期包括满族、回族等),使原有的精神民俗渐渐发生着变化。

[关键词] 明清时期;土默特地区;移民;民俗

[中图分类号] K248、K2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623(2008)05-0100-05

移民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是普遍存在的。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地区表现的形式和内容不同。移民的到来,不仅迁入了人口,而且植入了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在一定意义上,它是一个地区社会生活与民俗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之一。明清以来的土默特地区就是如此。

土默特地区地处黄土高原与蒙古高原的过渡带,地势平坦,水草丰美,亦农亦牧。历史上的土默特地区,自秦汉,特别是明清以来,由于战乱、灾害、屯垦、驻防、互市、商贸等原因,人口迁徙比较频繁。这里,我们以土默特地区明清以来的移民活动和现象为例,对移民与民俗相关的几个问题从理论上作一探讨和阐释。

一、关于历史上的移民问题

(一)何谓移民

在我国古籍中,移民与徙民是 synonym。《管子·七法》曰“不明于决塞,而欲殴众移民,犹水逆行”。《管子·四时》曰“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其事号令,修禁徙民,令静止”^{[1]卷2}。移民的最初含义是指人口迁徙的活动或行为。如,《周礼·秋官·土师》曰“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2]卷35}。即有让受灾地区的人口迁往丰收的地区之

意。后来,移民一词逐渐演变,又有了迁徙的人口之意,指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的人口,即指特定的人口或群体。《水经注》云,“魏秦州刺史治,太和迁都罢州,置河东郡,郡多流杂,为之徙民”,即移民^{[3]卷4}。因而,移民既是指人口迁徙的行为,又是指从一地迁徙到另一地的特定人口。显然,移民应该是指人口迁徙的活动和现象。历史上的移民是指发生在历史时期人口迁徙的活动和现象。

移民既是一种历史过程,又是一个历史结果。就过程而言即是人口的迁徙,是一种历史活动;就结果而言即是迁徙的人口,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例如,“走西口”、“闯关东”,既是移民的活动,又是移民的现象。因此,研究历史上的移民问题,就是要研究这种历史过程及其产生的结果。

一般认为,短暂迁居的人口为流民,长期迁居的人口为移民,历史上的移民主要是指后者。葛剑雄先生对此予以了特别的强调,指出移民是“在迁入地居住了一定时间的迁移人口”^{[4]卷1:10}。同时,移民也是一个历史的范畴。新迁入的人口或民众是移民,但居住了一定时期,并融入了当地居民,就成为当地人。

(二)移民的类型

移民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过程,它是整个人类历史运动过程的产物。就此而言之,这个历史过程的形成

[收稿日期] 2008-03-05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社科规划项目“明清以来土默特地区移民活动与民俗变迁”(06B048)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张文生(1957-),男,内蒙古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

乃是移民自发的或有组织的行为了使然。因此,历史上的移民大致可以分为自发型与组织型两大类。所谓自发型移民,指的是在自发状态下形成的移民活动或现象。如战乱、灾害、贸易等无组织的民众为谋生或避乱的自发行为所形成的移民现象和活动。所谓组织型移民,指的是在有组织状态下形成的移民活动或现象。如屯田、驻军、有目的的人口掠夺等政府或掌权者的有组织的、有计划的行为所形成的移民现象和活动。例如,明代大同兵变亡入土默特地区的人口为自发型移民;土默特首领俺答汗深入明境对人口有目的地掠夺就是组织型移民。

(三)移民的原因

历史运动的过程就是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移民这一历史运动过程的产物,必然受到来自这两方面的影响和制约。因此,来自于自然与人为这两个方面的影响,是造成移民的两大原因。

所谓自然原因,是指移民的产生由于自然方面,主要是气候异常所造成的自然灾害所致。如,瘟疫灾害造成人口大量死亡或减少,而医疗条件和技术的落后却不能有效地控制疾病的蔓延。民众为了生存只好远离家乡,远离疾病爆发区,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的移民。自然灾害是产生移民的主要原因。中国地域辽阔,南北东西的自然环境差异比较大,气候条件复杂。加之,农牧经济对自然的依赖性强。因此,就全国而言,可以说每年都会有水旱、雷电、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发生。农牧经济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就会受到极大的损害。无以为生的百姓,只好背井离乡,迁徙异地,寻找活路。如明代山陕地区的许多人就是遭遇自然灾害,“因饥谨困饿而北出塞外,到土默特地区谋生而成为移民”^{[5] 卷190}。另据史籍记载:清代雍正元年、二年(1723年、1724年)与光绪三年、四年(1877年、1878年)内地大旱^{[6] 16}。到土默特地区谋生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产生大量移民。

所谓人为原因,是指移民的产生由于人为方面的原因,主要是指人的有意识的历史行为和活动所致,如,军事驻防。土默特地区地处中国的北疆,而边疆地区是国防前线,政府或政权组织为了戍守或开发边疆需要大量的驻军。在中国历史上,边疆地区往往是地广人稀,加之交通条件不便与路途的遥远。为了解决军需的问题,军事驻防往往与屯田相结合,这些驻军将士及其家眷与耕者就要从其他地区大量迁徙而来。如,清乾隆初年,清政府在土默特地区设立绥远将军,大量驻军,并携带家眷随之而移居土默特地区。为此,清政府在土默特地区设立粮庄(即庄头地),招民垦种,以解决军需。归化城“庄头地当即由清政府招徕汉族农民垦种,直到今天呼和浩特还有庄头地上的丁、胡、李等姓汉人的后裔”^{[7] 1199}。

躲避战乱。战乱与战争在中国历史上是经常发生的,它破坏了人们正常的生产与生活秩序。为了逃避战责与躲避战乱,受到牵连的人们往往逃离战争区,远走边疆地区避难,成为战乱移民。如,明末清初,晋陕等处的抗清义军,战斗失败后,逃往塞外。“明末鼎革之际,籍山陕之官绅,起兵抗拒清军。兵败后无所为,则挈家至塞外逃祸。荒山僻野,耕稼其中。或有招捕急而入蒙籍”^{[8] 卷73}。

掠夺或招募。这是一种政府或政权组织的有计划的行为,以此解决劳动力与兵员不足的问题。前者是依靠军事行动来进行的。如,明嘉靖年间,俺达汗“岁略华人以千万计”^{[9] 卷16},以解决所需的农牧业劳动力、手工业匠人等问题。后者是依靠行政手段来完成的。雍正末年,“归化城都统丹津、协办尚书通智等奏请,将土默特境内膏腴之地八处,作为大粮官地”^{[10] 止卷}。乾隆初年,这一计划开始实施,计划的实施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清政府从山西等地大量招募农民到土默特地区垦种。

经商与仕宦。远离故乡到其他地方做官就任,带去家眷及幕僚,时间久远,定居他乡;在经商活动中,部分商人为了生意定居异地,成为移民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多的。乾隆初年,山西祁县乔姓和徐沟县秦姓二人自幼结为异姓兄弟,相偕来到内蒙古的萨拉齐,在老官营村当铺当了多年佣工,稍有积蓄,便转移到包头西脑包交通要道开设草料铺,兼售豆腐、豆芽、饅饼、零星百货。嘉庆年间,他们两家便合资三万两白银,开设了清代蒙古历史上有名的商号“复盛公”,以经营油、粮、米、面、酒、醋“六陈行”生意为主,有许多掌柜、伙计定居土默特地区,成为商业移民。

联姻。历史上中原王朝,或中央政府与边疆地区民族间,以及不同政权组织间用和亲或联姻的方式维持二者间的同盟或政治关系是常用的手段。皇帝的公主或皇室的宗女下嫁时要有一大批的随从、工匠和佣人随嫁。这些随嫁者,往往是公主生前侍奉公主,公主死后为公主护陵而留在异地。康熙的四格格嫁给蒙古王爷,呼和浩特市的府兴营子与小府村由此形成。前者主要是保护公主府的兵丁和建造公主府的匠人及其后裔;后者主要是公主府的下人及其后裔。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一般意义上讲,移民本人可以说并非是完全情愿的,总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小农社会。小农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追求安稳和安逸。你耕田来,我织布;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故土难离等民间俗语是小农社会的真实写照,也是普通百姓的愿望。“我们可以相信,以农为主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徙是变态”^{[11] 151}。不到万般无奈,他们“是不会离乡适他的”^{[16] 15}。这就是说,作为普通的百姓,面对自然的变异,生活的压力,有权势者的行为是绝对无能为力的。

因此,移民活动是一种被动的历史运动。对此,我们必须有明确的认识。

(四)移民的本性

就移民的本质和属性而言,迁徙它地无非是为了生存和发展。因此,生存和发展是移民的本质属性。生存即生活,是发展的前提。可以这样讲,人们的生存和发展是历史发展的第一要义。历史无非就是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人们的生活史。李大钊讲:“人类的历史,乃是在社会上的历史,亦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12] 卷3:538}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13] 21}亦可反过来理解:人们为了生活而在创造历史。可以这样认为:人类生活是历史的全部内容,同时也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历史上之所以产生移民,乃是人们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使然。这里不仅指个体的移民活动和现象,即使政府有组织的移民活动和现象亦是如此。区别只在于,前者是为了个人、家庭和家族的生存和发展;后者是为了集团、地区和政权的生存和发展。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是为了整个社会的生存和发展,还是为了统治者集团的生存和发展的区别,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五)移民的影响

所谓的影响主要是指移民对迁入地的影响。对于移民迁出地的影响因与我们所论关系不大,在此从略。大量的移民进入迁入地最主要的影响就是对环境的影响。就环境而言,我们认为不仅指自然环境,还应该包括人文环境。移民对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包括疆域的拓展、土地的开垦、资源的开发、经济结构的改变等,是一种直接和显性的影响;相比较而言对于人文环境的影响,包括人口与民族结构的变化、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观念与文化的变化等,是一种渐进和隐性的影响。因此,过去的研究侧重于前者,对于后者的探讨不够充分。“人口在空间的流动,实质上也就是他们所负载的文化在空间的流动。所以说,移民运动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的迁徙”^{[14] 卷1:102}。显然,探讨移民的影响,只注重对于自然环境影响的研究,而不重视对于人文环境影响的研究是不完全的。于是,我们有了本文第二部分讨论的内容。

二、关于移民与民俗变迁的问题

依上所述,移民的到来不仅迁入了人口,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随之而来的是他们原有的文化也带到迁入地。因为“人口的迁移实质上就是经济的迁移和文化的传播”^{[14] 16}。因而移民必然会对于迁入地的人文环境产生影响。其中,最先和最直接发生变迁的是,浸润弥漫于民间,并指导与规范着民众行为的民俗文化。这一情况在明清以来的土默特地区所发生的变迁至大且深。

民俗就是民间习俗,它是一种民间文化或大众文化。它主要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仪礼民俗和精神民俗。物质民俗主要指人们的吃、穿、住、用、行以及生产活动方面的习俗;社会民俗主要是指人们在交往中形成的各种共同体及其相关的民俗事项,如,家族、亲族、村社以及乡规民约等;仪礼民俗包括人生仪礼与年节习俗,如,婚丧嫁娶、生日满月、年关节日等的礼节和习俗;精神民俗包括人们的崇拜、禁忌以及民间文学、竞技和艺术等方面的习俗。民俗是带有地区性和群体性的一种民间文化或大众文化,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于明清以来土默特地区来说,移民是该地区民俗文化变迁的主要原因,或者说是主要原因之一。

土默特地区既是历史的概念,又是地理的概念。历史上魏晋时称敕勒川,隋唐时称白道川,辽金元时称丰州滩,明代因蒙古土默特部的入居而得名。我们所指为地理概念。地理概念上的土默特地区大致是,大青山以南、昆都仑河——黄河以东、蛮汗山以西,长城以北的土默特平原或呼和浩特平原。主要包括现在包头市的东河区、土默特右旗和呼和浩特市四区、土默特左旗、清水河县、和林格尔县、托克托县等地。

土默特地区北部是大青山前冲平原,南部是河冲平原。这里地势平坦、地域辽阔、土地肥沃、四季分明、日照充分。尽管降水量少,但是土默特地区正处在大青山南坡的大断崖层下,地下水位高,有许多自流水泉。历史上曾是“惟土穴出泉,挹之不穷”^{[13] 卷3},地下水资源丰富。大、小黑河经此自东北而西南注入黄河,又有了大、小黑河的灌溉之便,是亦农亦牧的肥美之地。同时,土默特平原也是中原地区通往蒙古高原的必经之处,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因此,历史上的移民活动就比较频繁。

大致说来,历史上土默特地区的移民活动可以明代为界。此前,在总体上和更多的时候是游牧民族迁入此地,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室韦、沙陀、契丹等。他们分别从西域、漠北、东部迁徙而来。他们基本上都是以畜牧业生产为主的游牧民族,因而对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改变不大,对于民俗文化的影响也不大,是一种承接关系。明代,特别是明清以来,移民主要是越过长城由南而北的农业民族,并且主要是晋北的忻州、代县、偏关、平鲁、河曲、大同、左云、右玉以及陕北的府谷、神木和榆林等地的汉族农民。大量的农业移民在短时间、大量地迁入土默特地区,使该地区的农业人口大大超过了牧业人口。据史料记载,自明初(14世纪末期)至清乾隆初年(18世纪中期)300多年的时间,土默特地区的牧场的五分之四被开辟为农田^[15]。“这说明土默特川已完成了由牧区向农区的转化”^{[16] 18}。土默特地区的生产方式、民族结构和

文化观念逐渐发生改变。

农业经济方式的开始与扩大,使原有的以游牧经济为主的物质民俗发生改变;以汉族为主的其他民族的人口的大量移入,使该地区民族结构,以及以血缘为纽带人生隶属为主要关系的部族社会民俗发生变化,移民文化观念的植入与渗透(前期主要是汉族,后期包括满族、回族等),使原有的精神民俗渐渐发生着变迁。总之,土默特地区随着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变化,该地区原有的社会生活与民俗文化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迁。

对于移民,“一般说来,受物质条件限制较大的日常生产和生活的习俗只能适应迁入地的环境,所以改变较快;而婚丧节庆、祭祀、禁忌等活动以及较少受到物质条件限制的某些生活、称谓等往往能在迁入地保持很长时间^[14]”。反之,亦然。移民对于当地居民原有民俗的影响和改变亦是如此。具体到土默特地区,自明代以来大量移民的迁入和农耕经济的发展,首先使该地区以生产和生活方式为主要内容的物质民俗发生变化。物质民俗,诸如饮食,包括食物与饮品等;服饰,包括服装与饰品;居住,包括居所的式样、材料与布局等;用品,包括生产与生活用品,及其制作材料与工艺等;交通,主要是交通工具;生产活动,包括生产方式、生产管理和生产礼仪等发生了比较大的改变。在这一方面的变化随着移民的到来,土默特地区的经济方式:由游牧为主一半农半牧—农业为主。这一历程的变化导致土默特人“服食起居与汉人无差异”局面的出现和形成^[16]。

关于社会民俗方面,如婚姻关系、居住格局、村落结构、称呼称谓、乡规乡约等,以及仪礼民俗方面的变化尽管不像物质民俗变化得快,但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移民的到来,使当地的人口和族群结构,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发生改变。在土默特地区改变最早和最大的是居住格局,即村落的形成和发展。土默特地区的村落是从明代的“板升”开始的。应该说“板升”就是土默特地区最早的移民点。移民的增多,“板升”在土默特地区大量出现。随之,土默特人开始住入“板升”,形成村落。居住格局发生的变化,人们的社会关系与交往关系必然发生变化。原来以血缘为纽带人身隶属为主要关系的部族社会,逐渐为村落社会所替代,特别是移民与土著杂居村落的出现,更促使人们在社会交往方面的礼仪与习俗的改变。

精神民俗方面,包括祖先祭拜、自然崇拜和原始宗教的内容和方式,表现在生产、生活、出行和饮食等方面的民间禁忌,以及民间文化等。移民对于精神方面的影响,相对而言不是那么直接,因而所发生的改变也比较迂缓。因此,兼容是它的基本特征。比如,在宗教信仰方面,在土默特地区的乡村,往往是“佛殿龙王庙”皆有的现象普遍存在^[17]。

在民俗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一方面,各民族不断汲取和借鉴别的民族的优秀民俗文化,移植于自己原有的民俗文化之中;另一方面,各民族的民俗文化通过交融和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变为各民族共同的民俗文化。因为,“民俗可以说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混合,因此,移民既要保持并传播迁出地原有的风俗习惯,也不得不加以改变,以适应变化了的物质条件^[14]”。土默特地区民俗文化变迁的情况大致如此。

具体而言可以归纳为三种情况:一是,移民原有的民俗文化主体保留而部分发生变异,其主体民俗主要是晋北汉族的农耕民俗。二是,当地民俗文化主体保留而部分发生变异,其主体民俗主要是土默特地区原居民,即蒙古族的游牧民俗。三是,移民迁入的民俗文化与当地居民的民俗文化,即晋北汉族的农耕民俗以及其他民族的民俗与蒙古族的游牧民俗在长期的交融、影响和碰撞中形成一种既不是移民民俗,也非当地民俗,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新的民俗文化。比如:

在生产民俗方面,土默特地区农事是主要的生产活动,但是蒙古族在饲养业方面,特别是对于牛羊的饲养情有独钟,他们不论在饲养技术、规模,还是在对牛羊的喜爱程度,都超过了汉族。

在居住民俗方面,土木结构的平房在土默特地区是比较普遍的,并多以南向的连锅顺山炕为主,显然这是晋北的风格。但是,在屋内的陈设不一样。汉族多以大红躺柜为主要陈设,蒙族是以立柜为主要摆设。

在服饰方面,尽管短衣逐渐代替了蒙古袍,但汉人“男女均喜用白手巾缠头^[16]”。这一习惯在上世纪的70、80年代土默特地区的农村一些老者还保持着,而蒙古族喜欢戴帽子。

在婚俗方面,土默特地区的汉族聘姑娘送亲的人数是有定数的,同时送亲人的身份也有明确的规定;而蒙古族聘姑娘送亲的人数是不固定的,凡是亲朋好友愿者都可以前往。

在丧葬方面,蒙古族受汉族民俗的影响,葬式逐渐由野葬改为土葬,但在葬俗方面汉族要披麻戴孝一身白,蒙族只系白布腰带;汉族在葬前有送行、到五道庙上香等仪式,蒙族则没有这样的仪式,等等。

移民对于土默特地区社会生活与民俗的影响随着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加深加大。并且是分阶段的,这是个渐进的过程。在明代,土默特地区的移民主要是晋北的汉族,因而其社会生活与民俗主要受到汉族,确切地讲,主要受到晋北农耕习俗的影响。这个影响是随着经济方式的变化而在各方面逐渐展开的。总体而言,这种影响是比较有限的。一方面,移民的数量相对来讲是少数,而且主要集中在现在的呼和浩特

市周围,呈现出一种以呼和浩特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态势。更重要的一方面,明代土默特地区在政治上是相对独立的,这样对于原有的社会生活与习俗有保护的作用。还有,明代的移民除了自发亡入,更多的是土默特地区有权者的有计划、有目的地主动地掠夺人口。所以,移民到了这里一方面对本地的社会生活与民俗给予影响。同时,有相当的移民也本地化,即蒙古化。于是明朝官方称之为“汉夷”,与“真夷”^{18卷2},即蒙古族不加以区别。如,万历十一年,兵科给事中陈亮条陈朝廷说:“板升夷人,众至十万。”^{19卷114}到了清代,特别是绥远将军衙署建立以来,移民大多是政府行为,因而数量大增,远远超过了土默特地区的原居民,民俗的变迁不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变化都比较大。当时移民成分仍然是以晋北以及陕北的汉族为主。

除此之外,随着清军驻防,大量满族旗人移居土默特地区,还有,来此经商定居的回族也不少。移民民族成分的多样性,对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生活与民俗的影响也是多样化的。需要指出的是,满族旗人尽管人数不是特别多,但其影响比较大。因为,随着清政府统治的确立和加强,土默特地区社会生活与习俗的变迁受政治的和统治民族的影响较大。比如,服饰与发式的改变就带有政治的强迫性。在居住民俗方面,满族一进两开的居所格局对于晋北风格的连锅顺山炕的居所格局带来了冲击。还有,政府性的垦荒行为,使土默特地区的农业化的进程加快,形成了自南而北的扩展态势,大概到乾隆年间土默特地区基本成了农业区。

民国时期,不仅移民仍在增加,而且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乃至数代也相继出生在土默特地区。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了原居民。“本省蒙旗,与汉俗接近者,首为土默特”^{18卷73}。土默特地区的社会生活与

民俗基本趋于内地化,而发生历史性的变化。

[参 考 文 献]

- [1] 戴望.管子校正[M].上海书店,1986
- [2] 周礼注疏[M].中华书局,1979
- [3] 陈桥驿,点校.水经注[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4] 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第一卷[M].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 [5] 毛宪.陈言边患疏[M]/明经世文编.中华书局,1962
- [6] 阎天灵.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M].民族出版社,2004
- [7] 阮芳纪,等.从清初到五四运动前夕呼和浩特地区农业的发展和土地问题中的阶级关系[M]/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3
- [8] 傅增湘.绥远通志稿[M].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 [9] 方逢时.云中处降录[M]/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 [10] 貽谷.土默特旗志[M].光绪三十四年印本.
- [11]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三联书店,1985
- [12] 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 [13] 德意志意识形态[M].人民出版社,1961
- [14] 王泽民.杀虎口与中国北部边疆[M].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
- [15] 清高宗实录[M].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
- [16] 啸岩.西北风俗谈:内外蒙古[M]/西北汇刊:第1卷第9期.
- [17] 绥远省教育会编.绥远省各县乡村调查纪实[R].内蒙古图书馆复印本,1935
- [18] 王士琦.三云筹俎考[M]/薄音湖,王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
- [19] 明神宗实录[M].台湾影印本,1962

ON MM IGRANTS AND FOLK CUSTOMS

——TAKING TUMD A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FOR INSTANCE

ZHANG Wensheng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Inner Mongolia, China 010022)

Abstract Since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a large number of agricultural immigrants migrated into Tumd area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hich brought gradual changes to the production style, nationality structure and culture concepts in this area. The beginning and expans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 pattern changed the original materialistic folk customs based on nomadic economy. The immigration of other ethnic groups with the Han nationality as the most important also changed the nationality structure and the tribal society folk customs which were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and personal affiliation. The implantation of immigrant cultural ideology (at the beginning, the Han nationality; later, Manchu, Hui and so on) were gradually changing the original spiritual folk customs.

Key Words Ming and Qing Dynasty; Tumd area; immigrants; folk custom

[责任编辑 张晋海]